

##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工业发展

□ 胡平原



如火如荼的陕甘宁边区生产合作社

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50年之间,在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的东部,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抗战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第二次国共内战起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新中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建制于1950年1月改称为西北军政委员会。

陕甘宁边区为了保证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主要是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出发,专门制定了适合边区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同舟共济,艰苦奋斗,于是,边区工业,蓬勃兴起,边区面貌,焕然一新。

抗战全面爆发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建

设厅接管了延长油矿。在延长正式设立了石油厂,先后设立工务、总务、会计、材料四科。开始迅速开展了恢复边区石油生产的工作,到年底共投资10574元,对个别油井进行了细心清理修复,并准备新建4号油井。由于战争的影响和破坏,油矿打井和炼制原油的机器设备遭到敌人破坏,一些机器零件散失于民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石油厂协同当地政府“召集群众大会,动员群众,把在红军撤离时失散的机器零件,向乡、区、县政府报告或送回油厂,政府分别给以奖励。因延川是老苏区,群众都有组织,在大会上,好多群众自动报告,将机器送回油厂。”

为促进恢复和发展石油的生产,边区贸易局也为石油厂从西安等地购进了一批机器零件。经过边区石油工人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努力,一些旧有的油井开始出油,新打的一口油井也开始出油,不仅很快地恢复了石油生产,而且原油的产量也有所增加。到1938年时,边区生产原油3527桶(每桶12.5公斤),炼制汽油167桶、特甲油1381桶、白蜡油856桶,这标志着边区石油工业的正式建立。陕甘宁边区的石油是边区重要的工业能源和抗战物资,也是边区自给工业建设的一项重要产业。由于对石油及其产品的迫切需求,就使边区政府对石油的生产极为重视。早在1937年5月,在边区政府成立的筹备工作中,后来担任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就提出了“在工业上注意发展石油、盐、煤、铁等主要生产”的边区工业建设任务。1938年,为了保障抗战军需公用的供给,延长石油厂移交由中央军委后勤部管理,任命陈振夏为石油厂厂长。石油厂最初实行供给制。后来进行了体制改革,“由供给为主,改为企业为主供给为辅的国家企业性质。”这样基本上实行国家企业化管理。在行政上设生产管

理科、经营管理科;在生产部门设有打油部、抽油部、炼油部、修理部等;并建立和规范了相应的各项管理制度,全体职工均实行集体合同制。

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把“加强对石油、煤矿的管理,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作为陕甘宁边区工业经济建设中的主要任务之一。

1941年1月,边区政府在经济建设计划中提出:“扩大石油的产量,最低限度应比去年提高3倍”的计划和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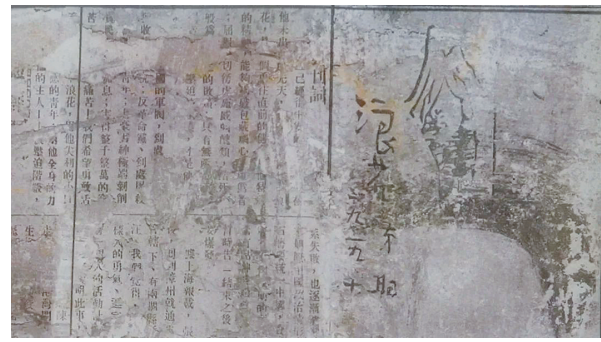
1942年12月,毛泽东在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论述边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时指出:“在发展边区的工业经济建设中,要把‘增加煤油产出,保障煤油自给,并争取一部分出口,作为边区经济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石油生产予以高度重视,不仅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投资石油生产,在每年的边区经济建设计划中都把石油做出了生产计划和目标,而且在生产物资和粮食供给上也给予照顾,以保障边区石油的生产。边区贸易局多次派人到西安等地,为石油厂购买生产机器设备及零件工具等,边区政府还指示当地政府为石油厂代购粮食等。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开始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禁止一切工业品、生活日用品、工业生产材料及工具等进入边区。为克服国民党政府对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造成的边区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边区抗日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以发展边区的自给经济,坚持持久的抗战。在这种情况下,边区对于石油的生产及其产品的需求更为重要,发展边区的石油工业也就显得更为重要。

(连载一)

##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份铅印军报《浪花》

□ 韦耀武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会议纪念馆收藏着一件珍贵的文物——1929年7月27日红四军政治部编印的《浪花》报创刊号(第一期),这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创办的第一份铅印军报。

1929年1月,为了打破赣粤两省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在当地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紧密配合下,红军经过了半年的艰苦转战,成功消灭了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等部,初步形成了以龙岩、永定、上杭三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

为了配合红四军的武装斗争,全面实现红四军前委在“闽西及龙岩、永定、连城、上杭、汀州、武平六县的游击计划”,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扩大政治影响,红四军政治部决定利用从敌人手中缴获的印刷机器创办《浪花》报。

当时,长汀和龙岩手工业比较发达,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李任予,将《浪花》报的印刷任务交给了以印刷为掩护,长汀早期地下党员毛钟鸣及其兄长毛焕章所创办的毛铭新印刷所。接到任务后,毛钟鸣决定采用闽西特有的玉扣纸印刷《浪花》报。玉扣纸纸质薄韧,用糨糊粘贴在粉墙上不易撕毁;同时采用铅印技术,虽然铅印比较费时,但是不会像油印那样因渗油而模糊,并且易于保存。

1929年7月27日,《浪花》报(创刊号)终于面世了。《浪花》报采用黑色单面铅印,四开二版。创刊号设有发刊词、特讯、短评等栏目。“发刊词”阐明了红四军政治部创办该报纸的宗旨是“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用他全身的力量致力于他的主人——被压迫阶级”。“发刊词”以简洁的文字揭露包藏祸心的反动统治者的罪恶行径,揭露了反动军阀到处征收苛捐杂税、反革命党到处屠杀爱国青年、土豪劣绅极端剥削贫民的罪行。

“短评”文中用许多事实,客观分析了“汪派”、改组派、“冯派”“张发奎部”等国民党内部各大派系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证明当时蒋介石只是形式上统一中国,以及新军阀之间混战的必然性。

“特讯”以漫画“灯光照耀”为头,暗示了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就像一盏明灯照亮广大贫苦群众的生活。内容刊载了龙岩县革命委员会制定的农村政策,全面阐述了苏维埃政府的分田政策和复收条例。

《浪花》报文字通俗易懂,成为当时红军重要的宣传工具和政治喉舌。红四军宣传员们在四处刷写革命标语的同时,也把一张张《浪花》报广为张贴。其中一份《浪花》报创刊号历经几十年风吹日晒、战火洗礼、世事变迁后,竟然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1985年7月,这份报纸被发现于龙岩市漳平市双洋镇(原宁洋县城)土地庙的内墙上。当时这份报纸已无法从土墙上剥离下来,为保存这份珍贵的原始样报,古田会议纪念馆的李瑞川、巫细珍、丁和隆、赖宗健等人,将报纸连同土墙一起切割下来,然后把这件重达200多公斤的红色文物运回了纪念馆。后经福建省文物鉴定组鉴定,其为国家二级文物。

这份报纸版面虽然已经破损,字样模糊,但是右侧仍然可以看出“浪花”“一九二九”的字样。

《浪花》报作为现存正式出版的最早的工农红军铅印军报,在党的新闻报刊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人们研究红四军的历史、红四军的宣传工作以及中共早期的土地政策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佐证。



·丝路文史·

## 从经典中汲取中国精神力量

——读《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南怀瑾先生著述导读》

□ 钟芳



《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南怀瑾先生著述导读》(东方出版社),系恒南书院院长李慈雄整理的南怀瑾文化导读课。全书分为十二个章节,在简要介绍南怀瑾的生平之后,重点就其《论语别裁》《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老子他说》《历史的经验》《药师经的济世观》《话说中庸》《庄子论》《新旧教育的变与惑》等14部重要著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解读,可谓由浅入深、鞭辟入里,为读者阅读南怀瑾著述乃至中国文化典籍提供了重要指引和参考。

1918年,南怀瑾先生出生于温州乐清。得益于父母的良好教育,南怀瑾从小就深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这为他日后研习中华文脉,探究中国文化的长久魅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南怀瑾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多年的人生积淀,总结出许多学习中国文化的心得体会。在他看来,探讨中国文化这一真命题不能陷于空谈,而是要把一个人的生命和精神都深深地融入融入其中。在深入领悟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之后,南怀瑾还特别强调做学问要懂得会应用。他把这一过程形象地称为“内修外用”。意思是说,在增强品德修养的同时,还能努力做到对社会有所贡献。在这本书里,南怀瑾阐释了几千年来东西方文化思想的演变路径,并指出:“未来中华民族的复兴,应建立在重建文化自信之上,整合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才能真正找出一条康庄大道。”

究竟应该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南怀瑾

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认识。他认为,首先应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认识到“中国文化是有完整的理论与实证体系的,它尊重所有的圣贤,超越宗教,但是又包含一切学问。”其次,他还认为,中国文化最独特的一点就在于,它不注重知识的累积,还关涉思想道德方面的建设;既关注个体的成长,也重视社会的和谐发展。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每个人都责无旁贷。既要树立正确的“三观”,也要葆有强烈的家国情怀;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力求从容自在地对社会有所贡献。总之,历经五千年的风雨淘洗,中国文化如同一条流动的“血脉”,把个人、家国和整个世界都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由此形成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精神;铸就了“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宽厚品格。南怀瑾进一步指出,重建文化自信,还要认识到“中华文化对国家治理有完整的理论和丰富的经验教训”。

抚今追昔,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贤就充分认识到“文化育人、文化治国”的重要性,并从人文的角度提出了要从“礼仪廉耻”等方面,强化治国理政、提振民族信心。纵观我们的文明历史,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尽管历经风雨、饱受磨难,但正是因为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等中国文化精神的滋养,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才能不断走向自立自强。南怀瑾由此自豪地说:“所以,思想文化

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灵魂,也只有抓住了灵魂,才能够真正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他进一步升华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要用心挖掘我们的文化宝藏,努力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融合创新,以此在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上,走出一条行稳致远的宽阔道路。

历史如灯塔,指引人们前行。在本书的《论语别裁》等一系列重要篇章中,南怀瑾还高度评价了孔子、老子、庄子等先贤们在传播中国文化上所发挥的举足轻重的作用,称赞他们用睿智深邃的思想深刻阐述了儒家、道家等丰富的学说。孔子的“仁、礼”主张、天下为公的政治韬略、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老子的无为而治、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大巧若拙等系列辩证思维;庄子的逍遥自在、旷达洒脱、物无贵贱、万物平等朴素哲学,不仅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交流互动与有效传播,而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维系着中华文明的薪火相传。

读书悟道,其义自见。当代中国,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征程中,文化思想一直是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的根脉之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都浓缩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之中,只要我们善于从名家名典中汲取丰厚的精神给养,就能在思想淬炼中领悟中国文化的精深要义,涵养和丰富精神世界,从而更加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 清代的嘉峪关税关

□ 陈彦友



肃州北城门外的肃州税务司衙门

交志》记载:“嘉峪关在清中叶始有监督,以安肃道设洋务委员及文案俄回语翻译等员,其经费由江汉关拨银七千两以为支出,收入则洋货进口正税、子口半税、子口单税等……正子税,进口各货物应纳关税三分减一征收。”外国侵略者为了使中国全面地成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品供应市场,在中国创立了子口税制,子口税制是在“协定关税”严重损害中国权益的基础上,进一步地破坏中国内地税制。子口税的施行,促使外国商品席卷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同时,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内地的原料搜括,也就更为广泛与深入。《中俄续议陆路通商章程》规定:各国所运来洋货至内地销售者,无论华、

洋商人,其所运之货,应将各货式样及斤两、件数、往何处地方,须逐一报明海关。海关既查其所报之货,征收税款后,发给凭单。该商一路所过关卡(即各子口),须将此单呈明之后,由各子口(即沿途关卡)验明所运之货与税单是否相符,如其单货相符,即在税单上盖用各子口(即一路关卡)印信,方可放行。

嘉峪关常关设立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任命比利时人斯普林格罗德(汉名林辅臣)为首任肃州税务司。因为嘉峪关属甘肃管辖,所以海关衙门就设在肃州北城门外。1865年8月,林辅臣作为4个比利时天主教神父的随从,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从一个不名一文的农夫,经过奋斗,成为肃州的税务司,头戴花翎,显赫一时,人称“林大人”。他不但掌管海关税务行政,而且兼任司法、公共事务、教育、卫生等事务的代表,可谓权倾一时。林辅臣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在肃州做税务司15年,在税务及商务中广结人脉,同时施医救病,为儿童接种牛痘,因之颇受肃州绅民好感,所以在他离任之时,民众敬献一柄万民伞。

内地与新疆地区贸易的增长,俄国加紧向中国西北倾销货物,加速了嘉峪关的发展。但是,在新

疆设省,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的情况下,面对开放的国际形势,嘉峪关的税收职能被近代以来兴起的诸多口岸所取代。同治时期的社会动乱使得嘉峪关受到较大的破坏,嘉峪关街市原本有“铺户、楼房、茶肆、酒肆、旅店、牙行约千余家,军民数千家。变乱后,庐舍零落,仅存十余椽”。嘉峪关在动乱之前曾经是仕宦商旅出入必宿之地,战后虽然“客路畅通,西域行旅络绎不绝,列肆陈货者亦渐来集,但未如旧尔。”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税自主后,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裁撤常关,废止子口半税制。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月,开征战时消费税,在兰州设立海关总关。民国34年(1945)1月,战时消费税停征,兰州海关及所属分关、卡,于同年底一并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海关业务,由甘肃省税务局代办。主要查验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和个人邮寄物品的漏税以及在国内销售应缴物品的补税工作,征收税额较少,随不同税种,分别缴入国库。民国时期的嘉峪关颓败不堪,破败的关城失去昔日的威严,成为游人凭眺怀古、合影留念之地。嘉峪关作为历史遗迹,矗立在时间的一隅,回望曾经的繁华而忙碌的岁月。(连载下·全文完)